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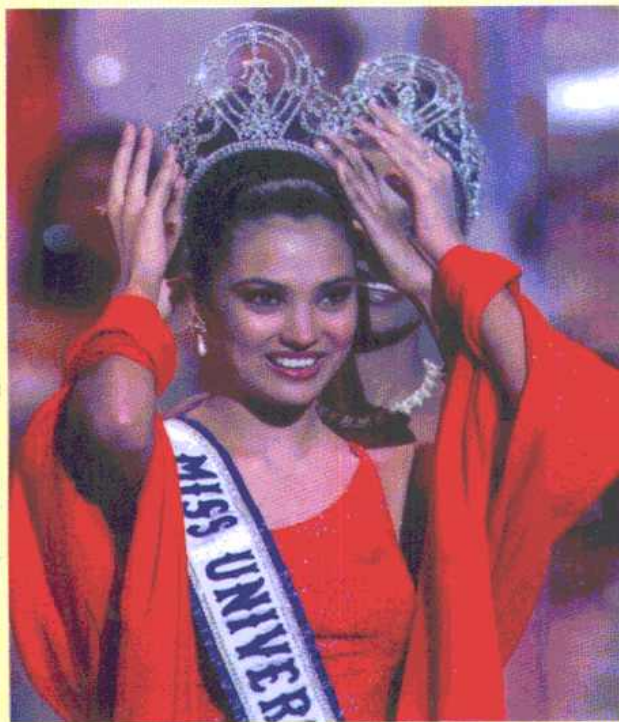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天己
信息 知识 观念 须时时更新

读者参考

丛书
35

DU
ZHE
CAN
KAO
CONG
SHU

天堂从此有笑声



学林出版社

- 为什么中国总是成为美国两党互相攻击的目标？
- 普京要唱老国歌
- 各淘汰赛开始了
- 基因抢夺战：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 “足球小姐”是个硕士
- 五个城市的爱情模式

读者参考丛书

(35)

天堂从此
有笑声

目录

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为何又下降?	1
是财富不均,还是机会不均?	3
“教育产业化”:困扰之局	5
21世纪:亚洲战略格局如何构建?	9
美国的 NMD 会带来什么?	13
为什么中国总是成为美国两党 互相攻击的目标?	14
普京:集权之路的试探	15
德国重提“核心欧洲”论	19
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五个问题	20
部分国企争戴“亏损帽”	22
价格走低并非只因供大于求	24
“新经济”三问	25
龙永图趣说 WTO	28
三足鼎立:最后的中国	32
新经济在中国为时尚早	34
网络淘汰赛开始了	35
股市不能成为豪赌工具 ——经济学家吴敬琏访谈录	37
藏金不如“藏股”	48
什么是纳斯达克?	42
梁定邦:“顾问”无压力	43
“因特网先生”钱伯斯	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从此有笑声 /《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0.10

(读者参考丛书 / 林雨主编)

ISBN 7-80616-808-7

I. 天... II. 读... III. 文摘 - 中国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 第 42585 号

天堂从此有笑声

读者参考丛书(35)

2000年10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雨

责任编辑:金辉 洋叶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81号

邮政编码:200233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文庙路120号

邮政编码:20001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万

ISBN 7-80616-808-7/Z·43

定价:10.00元

1 10 20 30 40 50

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为何又下降?

□赵明

■最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个别地方违背了科技与经济分工协调的基本规律,超前要求科技活动实现商业化,特别是采取限定时间的强制性措施,使大学和科研机构以自我实现短期经济效益为目标进行改革,破坏了科技经济大循环的运行机制。

■当前科研机构和大学在改革中强化了面向经济的微观动力机制,但弱化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宏观机制,这是我国的科研机构75%以上的科技力量已经投入科技主战场,而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根本原因。

不久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了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在本年度报告中的排名又下滑3位,列第28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也比1999年下降2位,列第31位。

1999年因科技竞争力排名大幅下降一片哗然、反应强烈的中国科技界,在此次排名结果公布后选择了沉默,这很让关注此项排名的专家不安。

近几年一直在跟踪研究这方面情况的两位专家、科技部中国科技

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技指标研究组杨起全、吕力之两位研究员,对今年的洛桑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后表示,尽管该报告仍有值得完善之处,但评价结果对正视我国现实状况和科技系统内部要素匹配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杨起全和吕力之指出,与1999年科技要素构成指标的大幅变动不同,2000年度报告的26项指标构成没有变动,此次排序与上年有很强的可比性,对我们的警示更为直观。“企业间技术合作”和“企业与大学间技术转移”两项指标排名大幅下降,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当前科技体制改革政策。

大学及科研机构封闭 倾向加剧

两位研究员告诉记者,今年的洛桑报告中,对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下降影响最大的两项指标是“企业间技术合作”和“企业与大学间技术转移”。前者排名第35位,比上年下降10位,后者排名第30位,下降7位。而这两项指标正是近年来衡量国家技术创新成效的关键指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创新机制是否完善。

他们对全国 3346 家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统计调查,也证实了我国企业技术开发合作及知识技术的流动确实处于较低水平。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我国技术创新活动中“合作研制”和“委托研制”的比例分别为 12.4% 和 3.9%,这在企业技术创新来源中所占比例是最低的。

两位研究员坦率表示,一个国家技术交流、知识流动迟缓的原因有多个方面,诸如知识产权的合理认定与有效保护,社会深层文化积淀对企业合作精神及对“竞争性合作”观念形成的影响等等。我国知识技术交流与合作状况评价下降,说明我国科技创新系统整合效率降低。最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个别地方违背了科技与经济分工协调的基本规律,超前要求科技活动实现商业化,特别是采取限定时间的强制性措施,使大学和科研机构以自我实现短期经济效益为目标进行改革,破坏了科技经济大循环的运行机制,既浪费了大量的技术开发人力、物力资源,又加剧了封闭倾向,不利于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大学及科研机构过分注重直接的、短期的经济效益

据两位研究员讲,科技界有些人认为,当前科研机构和大学在改革中强化了面向经济的微观动力机制,但弱化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宏观机制,这是我国的科研机构 75%

以上的科技力量已投入科技主战场,而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根本原因。

他们指出,对我们大学办科技企业,包括微软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博士在内的许多人曾提出尖锐批评。在国外,像美国硅谷的大学也鼓励教师和学生创办企业。如果一位教师去创业,他可以停薪留职,企业成功了,他就可能干下去,若创业失败了,他可以返回学校教书。这都是个人行为。而中国的大学则不一样,学校出面开了许多公司,学校要为企业的职员提供住房、申请职称,为企业提供地皮,为企业上市申请政府指标。企业若挣钱还好,若亏损了,学校就要牵扯更多精力。

杨起全和吕力之说,学校应专注于教育,为企业和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科技、教育、经济的结合日趋紧密,但是社会系统的功能性分工、协作机制并没有消亡,专业化依然是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主要方式。我们目前的许多做法忽视科技发展自身规律,过分注重直接的短期经济效益,这种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在自身基础上成长为以科技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现在则有可能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羁绊。

两位研究员直言,洛桑报告是面镜子,我国知识、技术流动指标一直排位较低,2000 年降到最低点,严峻的现实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是财富不均,还是机会不均?

□李新生

以机会分配为衡量尺度

现今,在平等和效率的关系上,普遍的看法都认为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提高了效率必然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强调了平等又会影响效率。但是实际情形并不尽然。在企业中,有时收入的差别,并不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反而会消磨他们的工作热情;相反,有时物质利益的适当平均,会稳定职工的情绪,有利于企业生产的发展。如果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来看一些现象,就会感到,人的利益分配是否均等,并不必然地与社会制度的演进存在同一趋向。

比如看一下美国,其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有目共睹,比尔·盖茨几百亿美元的财富与一般劳动者几万美元的年收入相比差距何其巨大!但我们仍然看不出美国社会有因此而崩溃的迹象;相反,前苏联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远远要小于美国,但社会制度却发生了解体。可见,利益差别的大小,并不一定是一个社会或企业制度是否合理的主要尺度,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人们对这种差别的认同程度。

既然财富的不均等分配是人类阶级社会至今一切社会的共有现象,那么单据财富是否均等就很难判定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而且人们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我国曾经实行的管理制度证明,实行强制性的均贫富,对生产力不是推动而是破坏。于是人们必须有一个尺度,据此可以说明,什么时候不均等的财富分配是一种进步,什么情况下不均等的财富分配是一种反动。这个尺度就是机会分配!

在机会分配较为均等的社会中,财富分配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不同能力在竞争中形成的;而在机会分配不均等的社会中,财富分配差别则是由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强制性因素形成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对这种差别的心理认同程度较高,财富分配的差别对人的劳动积极性产生激励作用;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财富分配差别则强化了人的社会不公平感。由于机会分配不均,排斥了很大一部分人凭能力获得财富或社会承认的可能性,必然要引起社会下层阶层的不满或愤懑。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发生社会或企业危机。据此认

识,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差别如此之大但社会仍能保持稳定,而一些垄断经济国家(如前苏联)尽管财富分配差距相对较低但社会却动荡崩溃这一现象。

坚决迅速地推进 机会平等化

根据这一认识来看待中国 20 多年来的改革历程,也可以概括为社会机会分配逐步平等化的过程。

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前的 20 多年中,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垄断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的下部阶层,几乎没有靠劳动及个人能力致富的可能性。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呈现的是社会机会的高度垄断和社会财富平均化分配共存的特点。

中国的经济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场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改革,实质就在于向农民开放了一定的生产致富的机会。由于机会的开放,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才使中国农村社会由一穷二白在短期内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自此中国改革走上了机会逐步开放的过程。从乡镇企业的发展,到城市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到私营企业的普遍存在,都是这个过程的体现。

随着这个过程的进展,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达到了过去没有的程度。但是中

国社会机会分配平等化的过程是有限的。现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机会实质上并没有向大众开放。一些特殊人群,可以不是凭个人的能力,而是凭借自己对机会的特殊占有来获取社会财富。当今中国社会中权力阶层贪污腐败现象的存在,而且涉及的财产数量巨大,就是这个时代特征的一种表现。

现今,中国社会分配差距正在迅速扩大,但是如果这种分配差距很大一部分是由机会分配不均造成的,这就十分危险。这样的财富不均等分配,不但不会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反倒会强化人们的社会不公平感,引起社会的动荡,对生产力造成破坏。

由此可见,中国今后并不是要一般化地反对财富分配差距的存在,而是要坚决迅速地推进机会平等化的过程,一切该向公众开放的机会,如劳动机会、投资机会、政治机会、对权力的监督机会等等,都要尽量达到透明公开。改革越往前推进,解决机会分配不平等问题难度可能会越来越大,因为在机会分配不均等已经造成了财富分配差距的情况下,这种推进会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是从社会进步的方向和目前相比其他方面的改革成本而言,这也是相对易于实行的改革措施。而如果向后延缓,既得利益人群的阻力也相应地越来越大。

(摘自《南风窗》)

“教育产业化”：困扰之局

□陈莉 叶劲松

一年 8000 元依据何在？

教育产业化的内容之一是提高学费。对此，有位专家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说，目前将高校学费提高到 5000 元，人们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学费 5000 元，加上杂费、书籍费、住宿费、日常生活开支，最保守计算一年至少需要 8000 元左右。专家没讲人们能接受子女读大学一年开支 8000 元的经济根据是什么。从 1999 年底约 1.4 万亿元的农村居民储蓄余额来看，9 亿农民，平均每个农民存款仅 1500 元，3 口之家也就不过 4500 元左右的存款。凭这点存款，仅够一个大学生半年多一点的开支。所以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学教师说，“幸亏自己在 80 年代读大学时未扩招，不然的话，我家境贫寒，肯定读它不起”。

1999 年底，我国城镇居民储蓄余额约 4.5 万亿元。但据有关方面估计，居民储蓄中有 1 万亿元以上是公款私存。另考虑到巨大的贫富悬殊（据有关资料，占我国人口总数 3% 的最富有人士，拥有全国居民存款余额的 40%），一般城镇居民 3 口之家存款只有 2 万元左右，假如他们以后每年的存款增长仍是 1999 年城

乡居民存款余额增长率——11.6%，4 年总共增加存款约 1 万元，加上原有存款 2 万元，共 3 万元。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城镇家庭，有一个现在进校的大学生，这个大学生的 4 年生活将耗尽他们家以前存款和未来 4 年的新增存款（前提是这 4 年学费不增长，否则还要出现赤字）。

以上的分析还是建立在城镇居民（我们先不说经济能力更差的农民）储蓄只是用于子女教育这样的假设上。而实际上，城市居民的储蓄目的，除用于子女教育外，还包括用于自己及家人的意外急用、养老、买房、应付失业等等。所以，城镇居民承担高学费的能力远比以上分析低。据 1999 年 9 月 23 日《金融时报》报道，“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平均至少约需 1 万元左右。而据对上海市民的抽样调查，将近 50% 的家庭的承受力在每年 3000 元以下；1/4 的家庭的承受力在 4000 ~ 5000 元之间”，即 75% 的家庭承受力在 5000 元以下，而据另一调查，广东的情况也与上海相类似。我国经济最发达、市民最富裕的上海和广东的大多数市民尚且如此，那么其它省份的市民对高学费承受能力肯定更差。另外，我国城镇还有数量巨

大的贫困群体,他们的困难就更大了。据悉,1998年,我国处于停产半停产企业涉及职工780万,而在亏损企业工作的职工2000万。对他们来讲,工资收入维持自己和子女(或父母)的生活最基本需求外所剩有限,甚至入不敷出。他们和比他们状况更差的1100万下岗职工(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8年第一季度,全国下岗职工月平均生活费收入仅84元。这甚至不够维持他们本人的生活),根本不能承担子女读书一年所需的8000元开支。所以,有些专家对居民经济承受能力的估计,可能是以他们那一个阶层的情况作出的,总给人以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感觉。

高学费带来社会问题

近两三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入一直以1位数增长(农民和国有企业工人等的收入增长应低于平均数),而高校学费却一直以两位数增长(如1999年增长20%)。一方面是经济底子薄而收入增长缓慢,一方面是学费猛涨,这使许多家长想供孩子上大学但因为经济困难而无能为力,从而使这一群体的许多子女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97年高校学费提高,当年即有约11%的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即使因为现在的学校收费还没达到“真正的市场价格”,使得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还能进入高校,

但他们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1999年一家报纸曾报道,成都一个农村大学生,因为自己上学而使家里不堪重负,弟、妹只好中途辍学。为了减轻父母负担,也为了弟、妹前途,他拒绝接受家里经济支持。但自己又无任何收入,为读完这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他铤而走险,去盗窃自行车,被人发现遭到殴打,又羞愧,又无钱而未求医,结果内忧外伤,不治身亡。这个惨剧产生的原因,既因为他一念之差,更主要是家贫无以续学。而这种贫困生并非个别,据重庆市教委1999年调查资料显示,在重庆市高校学生中,月经济来源在200元以下的贫困生约1.7万人,占高校学生总数的16%~18%;月经济来源不足100元的特困生约7000人,占学生总数6%~7%。

事实说明,现在的高校学费,对许多家庭来说,远不像一些专家说的那么轻松。这学费建立的高门槛将很多贫困阶层子女挡在高校之外,即使有的费尽气力翻越过这道门槛,家庭经济实力也元气大伤,使子女读下去感到很大压力。正如反映大学贫困学生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所表现的贫困生在大学的心理:自卑,并且自卑到孤僻。而猛涨的学费将再次夺去他们的部分生活费,加剧贫困生的贫困,从而加重他们在学校里的自卑。这极不利他们身心健康成长,不利他们与周围社会相处,不利毕业后的寻找工作,甚至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仇视。

助学贷款能解决问题吗？

有种观点认为助学贷款能解决贫困家庭子女入学的问题，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如果说一般的消费贷款对刺激工薪阶层的消费上没起多少作用，助学贷款对贫困学生的帮助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目前，我国开办的助学贷款分三类，即由中央财政贴息的国家助学贷款，地方财政贴息的国家助学贷款和经营性助学贷款。对贫困生来说，如要贷款，肯定愿意申请少支付利息的国家助学贷款。人民银行规定，国家助学贷款由工商银行独家承办，经营性助学贷款各商业银行均可开办。

现在全国高校在校生约 360 万人。据有关方面分析，按 20% 比例的贫困生计算，约 72 万人需要贷款。如果按每人每年贷款 5000 元计，每年助学贷款约 36 亿元。但据工商银行资料，截至 1999 年 12 月中旬，总共发放各类贷款仅 112 笔，贷款金额 76.6 万元。其中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近 1 万人，贷款意向 4 亿，但实际发放国家助学贷款仅 65.4 万元。

造成助学贷款“叫好不叫座”原因较多，重要原因之一是担保、抵押比消费贷款困难得多。按有关规定，助学贷款必须有抵押或担保。由于农村住宅不能抵押，这就基本断绝了农村学生获得助学贷款的这一条途径。而担保一般要求是学校

所在地的担保，由于贫困学生在学校附近一般都是人地生疏，要找担保人很困难，学校也不愿为学生担保。按现行规定，还款期限不超过毕业后 4 年。如一个学生 4 年中每年贷款 7000 元，毕业后不计利息每年至少也应还 7000 元。所以即使能顺利找到工作，他除去生活开支后，每年能否还结余 7000 元来还呢？如果考虑毕业后的就业困难，学校担保风险更大。要是再考虑到贷款学生毕业后流向很广，就业流动性强，学校对学生去向的追踪和贷款的追索回收等困难，学校根本不愿意为学生担保。高校认准一点：凭什么你银行获利，我来担风险呢？这应该从由学校担保的特困生助学贷款就可看出。从教育部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获悉，由于学校不愿为特困生担保，所以到 1999 年 12 月中旬，中央部委所属院校尚没有一笔申请办理特困生贷款。

鉴于特困生寻找担保困难，学校又不愿提供担保，从而使助学贷款发放严重受阻。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于 1999 年 12 月 23 日联合颁发《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若干意见》，据此意见，“确实无法提供担保，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以及其他学生均可申请信用方式的国家助学贷款”。字面上，用“信用方式”代替担保，似乎克服了担保难的问题，将有助于助学贷款的发放。但是，没有担保，意味着学校等担保人的风险就直接转移到发放贷款的

商业银行身上。而一些学生毕业几年不还贷款的情况,使商业银行对没有担保的学生的信用很不放心。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为为了贷款的安全,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意向高校贫困生提供贷款。“信用方式的国家助学贷款”发放受阻。

低收费的背后

从历史环境看,低学费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低学费是与我国低工资相适应,是低工资的补充,是一种社会福利,是国家财政以教育补贴形式给居民的经济帮助。它的直接依据是许多居民收入水平低,支付教育费用有困难。

而以提高学费为内容之一的教育产业化,要求教育作为一个盈利

为目的的产业,其“回报所得不仅要能够抵扣生产成本,还要取得不得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为此有专家提出“向市场机制过渡,实现学生学费由本人及家庭承担,使之成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他们还认为以前的低学费没有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学费,是接受了教育服务而不付出代价的表现。事实上,教育补贴等社会补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广大纳税人交付的。也就是说,通过国家的低工资政策,用税收等措施将一部分工资收上去,再由国家将这部分资金转化为教育补贴等等,又重新用于全体国民。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虽然是低学费,但普通群众已为其子女交了“真正意义上的学费”?

(摘自《南风窗》)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最近在谈到社会对人才需求和用人制度改革时指出,一张文凭终身

受用的时代已经过去,要转变传统的人才观念,形成使用人才重素质、重实际能力的风气。

李岚清说,社会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现在一些办得好的职业学校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形势很好,就反映了这种对人才多样化的需要。成才的道路是多样化的,一张文凭终身受用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当代社会,真正需要看重的是素质、业

用人片面强调 高学历须纠正

绩、能力,不单单是文凭、学历。

李岚清说,要全面推进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社会用人制度改革。当前不少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在招收职工时,片面强调高学历,很多本来不需要较高层次学历的岗位,也都要求具有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的人员上岗。这种现象须尽快纠正。劳动、人事部门要按照江泽民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进一步改革用人制度,努力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能的社会环境。

(摘自《人才市场报》)

21世纪:亚洲战略格局如何构建?

□张召忠

本世纪中期,在经历了两次大战之后,英国衰败了。继而,与美国抗衡的苏联也解体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超级大国,这种好日子现在刚刚过了十年,美国一统天下的超级大国梦还没有做完,21世纪还要继续维持美国的世纪。法国有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做《21世纪不属于美国》,书中分析了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崛起和挑战,这样的话美国能不担心吗?所以,什么太平洋世纪,亚洲世纪,这种话美国人最不愿意听,它希望整个21世纪仍然是美国世纪,世界仍然是一极化,它还是继续当“球长”领导世界总潮流,世界上的事都应该由它说了算。

21世纪初期,亚太地区在安全方面,仍然是美国和日本主导整个形势的发展,其中,以美日军事同盟最为令人关注。美日军事同盟体制主要是通过“新的安全保证条约”和“防卫合作指针”形成的。在欧洲,美国主要是利用北约来打压欧洲,在亚洲,他就是想利用日本来打压中国。两个地区不同,基本思路是一样的,就是手里始终得拎着个棍子,谁要是不听话,就举起来吓唬吓唬,给你点儿厉害看看。二战日本

战败后,美国为了制衡中国和苏联,在日本驻军,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就这样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下实力不断增强,现在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经济上堪与美国相提并论,在科技上某些方面还超过美国,在军事上武器装备质量和作战能力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几个强国之一,在亚太地区首屈一指,在军费投入总额上达到世界第二位。日本能够发展到今天,与美国的庇护是分不开的,因为在长期冷战时期,日本没有在防务问题上花什么钱,全靠美国的保护伞,所以它是在美国人眼皮底下一天天坐大的。现在日本加大军费投入要重振昔日大日本帝国的“雄风”了,强大到这个地步,连美国也开始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日本已经对美国构成现实的挑战,美国感到不安全了。《日本可以说不是》就代表了相当多日本人的观点,日本人认为你是超级大国,我的实力也不比你差多少,你干嘛还在我国家驻军?我凭什么还要听你的差遣?今后,没门儿!所以,21世纪的日本,是想在亚太地区称王称霸,在世界上当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特别是想进联合国安理会当常任理事国。什么叫财大气粗,看

看日本你就有切身体会了。美国人后悔不迭,这不是养虎遗患吗?日本这只大老虎在笼子里关了五十多年,现在刚刚被放出来,怎么就感觉有点儿横行霸道的味道?美国的指挥棒逐渐不灵了,开始和主人叫板说不了。这种感觉,颇有点儿像欧盟那种独立主义倾向。所以,美国可能要采取用北约控制欧盟的办法来利用日本控制亚太地区。好多同志可能有点糊涂了,你看,美国与日本之间,美国与欧盟之间,有那么多矛盾,怎么还说多极化没有形成呢?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属于集团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没有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与美国和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可以联合起来统一对付威胁,威胁消除之后,又开始窝里斗。

这次科索沃战争对日本是个强刺激。看看德国和意大利,他们都和日本一样,曾经是二战中的战败国,根据国际法都是不允许向国外派遣部队,更无权参加战争了,可人家这次不是都破例了吗?即便是对南联盟公开进行侵略战争,世界上又能怎么样它们?德、意都已经复活了,我们日本为什么不能复活呀?4月21日,日本官房长官就有一个讲话,说过去我们讲“周边事态”时把朝鲜和台湾都划到了里边,为此我们做了两条规定。现在还有一条需要补充一下,什么呢?就是日本

的周边国家,如果因为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爆发武装冲突,且影响到本地区安定的时候,日本就可以出兵干涉。这不是跟北约东扩和“人权高于主权”,只要“人权受到侵犯就可以出兵干涉”的克林顿主义是一样的了?根据这位官员的意思延伸下去,是不是说中国的西藏、新疆出现动乱的时候,日本就可以直接出兵干涉了呢?是不是如果中国就台湾的独立问题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日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出兵干涉了呢?美日之间原来就有一些军事同盟条约,冷战结束之后,这些东西照说都应该淡化或者取消,但美日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却更加紧密了,现在又搞了新的安全保证条约和防务指针,同时把中国台湾列入其周边事态的界定之中。日本以为,无论是台湾还是朝鲜半岛,只要是一出事,就可以和美国一起来维持地区的安全。国会没有必要再批准了,干就是了,《周边事态法》不是已经批过了吗?

美国通过日本来打压亚太地区的具体手段很多,现在美日签署的一系列军事同盟条约,就从法律上给予了基本保证。在军事上一个最大的动向就是TMD问题,美国拉着日本一起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御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潜在的目的是拦截中国的弹道导弹,以及对抗印度和俄罗斯可能的弹道导弹威胁。美国不是在空中喊,是在真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事情。TMD 这件事就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它使美日在武器装备、反应体制和作战训练等方面都绑到了一起,影响是巨大的。如果将来再扩展到我国的台湾或某些其他国家,这件事就会很麻烦。当然,TMD 再先进也绝不会把弹道导弹都给拦截掉,但这种事情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潜在影响要大于实际的作战影响,它对整个战略格局是一个很不利牵动。

亚太地区还有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印度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的问题。印度瓦杰帕伊政府现在来看是个过渡政府,将来大选是否能够继续执政目前还很难说。瓦杰帕伊在他执政的十个月中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进行了核试验,另一个是进行了导弹试验。虽然国际上对这两件事都很反感,但印度根本就不理这一套,现在它要加入世界核俱乐部,宣称自己已经有核国家了。印度的导弹现在已经能够打到 2500 公里,可以威胁到北京,再有几年,将达到 4500 - 6000 公里,覆盖大部分亚太地区看来将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它这么干不仅我们很头痛,美国和日本也感到很紧张,大家都感到很不安全。十年来,全世界都在搞裁军、撤军、削减军费军备,在核武器方面的一举一动更是为世界瞩目。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为什么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扩军备战呢?国际上不理解,国内人民也很反对,现在不是已经

没有内忧外患了吗,你应该把钱花在经济建设上,应该让人民改善物质生活,为什么还要往核武器和导弹武器这种无底洞里投资呀?这些民声民意可能是导致瓦杰帕伊政府在大选初期垮台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现在,瓦杰帕伊还是总理,政府还在行使权力,这位总理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大致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鼠目寸光,我当初搞核武器和导弹武器,你们都骂我,现在看看科索沃吧,没有实力你就等着挨揍吧!光发展经济有个屁用?必须得有军事实力做保证!他继续为自己的强硬政策做辩护。

科索沃战争对 21 世纪的国际战略格局有哪些影响?这个问题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印度也感到了危机所在,它认为美国和北约在南联盟这么干,将来会不会带着日本在亚洲也这样干呀?他会不会在将来折腾印度呀?印度和中国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之间还折腾什么呢?能不能不要自相残杀呀?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干点什么事呀?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曾经有一个建议,想拉中俄印三国搞一个军事同盟。我个人认为这种联盟毫无意义。我们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来不和别人搞什么军事同盟,如果破例搞这么个东西,正好让美国抓住把柄,你看看,我说是“中国威胁论”嘛,现在好了,又多了两个国家。那美国、日本、韩国等干脆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我们这三个

国家一年的军费加起来,也不如美国多,所以你跟它搞对抗没有多大意思。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参加也好,不参加也好,我感到印度和俄罗斯可能会发展成为很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同盟方面。俄罗斯出售给印度的武器都是最好的。它能卖给中国、越南什么东西,肯定要卖给印度更好的东西,在战略上要找个平衡。印度的核武器试验、远程弹道导弹、核潜艇、航空母舰、三代战斗机先进的高技术武器,几乎全部都有俄罗斯的影子。我赞成与俄罗斯和印度搞战略伙伴关系和友好关系,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但对于印度在军备方面的过度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失衡却不能不提高警惕。

5月8日,我们驻南大使馆刚刚被炸之后,菲律宾就用军舰把我们的渔船给撞沉了,62个渔民被抓,受尽欺侮。一个是打我们的外交机构,一个是撞我们的民船。我们记得清清楚楚,二战后美军曾经在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长期驻军,90年代初期,菲律宾人民高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从菲律宾滚出去”的口号,愣是把美国佬给轰出去了。菲律宾认为,冷战都结束了,你们还在我们的国家搞空军基地、海军基地,这不是对我们国家主权的侵犯吗?你们得滚出去,因为租用协议到期了,我们也不再续签了。但是,菲律宾是个穷国,每年最多只能拿出一

二十亿美元来搞军备,它很穷,势单力薄,因此,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需要靠一棵大树。靠哪一棵大树呢?就只有靠美国。整天与美国套近乎,说虽然你们的军事基地没有了,但是你们的军舰在我们这儿停靠还是欢迎的呀。今年,菲律宾与美国干脆又签订了一个军事协定,双方可以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和应付突发事件。签订这个条约之后它心里就感觉踏实多了。你别看我菲律宾小,但你不敢惹我。你要惹我后面就有人来管你,那就是美国。菲律宾这会儿有了后台老板,有人给它撑腰打气了,所以胆子越来越大,在战略上居然主动和美国打起配合来了。在亚洲抱有同菲律宾一样想法的国家还有没有呢?有,还有不少呢?所以我们必须睁大眼睛才行。

菲律宾和我们有矛盾,主要是海域划分和岛礁争夺问题。类似的情况在南海我们与越南等其他国家也是有矛盾的。南海是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有八十万平方公里属于争议海域,争议的岛礁有几十个。现在的形势是,周边国家已经占领的岛礁和海域继续进行实力占领,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巩固军事实力,同时开展大规模经济开发,争着抢着在那里开采石油和渔业资源,从中捞取了不少实惠。有的国家每年可以获取几十亿美元的收入,这对于一个小国和经济不发达

(下转第133页)

美国的 NMD 会带来什么？

□ 亚 文

美国：老子就这么干了

美国总统克林顿不久前访欧、俄，主要目的并非兜售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而是要向这些国家宣告：“不管你们赞不赞同，老子就这么干了。”至于 1972 年美苏签订的“反弹道导弹协议”，莫斯科若坚持不修改，美国退出就是了。

美国要为自己打造核保护伞，据说是为了对付所谓“流氓国家”导弹突袭，但这个理由只能骗老实的美国老百姓。这次克林顿访问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建议俄美共建防御体系，克林顿即装聋作哑。

欧洲：恼火得不得了

欧洲一致反对美国一意孤行。因为如果真有“流氓国家”发难，暴露在保护伞之外的欧洲国家将成为打击目标。欧洲更担心美国执意推翻“反弹道导弹协议”，也就会打破过去 40 年的东西方“核恐怖平衡”，把欧洲卷入新一轮国际核子军备竞赛，也使欧洲重新处在俄罗斯的核威胁阴影下。

俄罗斯：还是觉得中国好

美国搞 NMD 名为防御，俄罗斯的感觉却是对自己的致命威胁。美

国的 NMD 可以对付“流氓国家”，当然也能废去俄罗斯的核武功。国家丧失实力，普京讲的话克林顿根本不当一回事。普京于是向欧洲国家提议合作建立防御体系，以同美国抗衡，看来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俄罗斯要对付 NMD，惟一有效的策略是加紧同中国的军事合作。

台湾：别高兴得太早

对美国发展 NMD，中国除了反对，只有加快开发和装备自己的战略核打击力量，以求突破美国的保护伞。北京近日可能再次试射东风 31 型远程导弹，应该是对美国的回应。此种导弹可以打到美国西岸，对美国最具威慑力量；美国如果介入台海战事，必须考虑到本土受袭的风险，这也使美国用心“管住”台北，以免给自己添麻烦。

如果美国真有可能建立足以抵挡中国导弹的防御体系，可能促使中国赶在美完成 NMD 前，跟台北最后摊牌，一举解决统一问题。所以，台湾对 NMD 实在没有高兴的理由，反而应担心军事摊牌提前到来。克林顿也应该想清楚，NMD 将导致俄中进一步联手，还将逼迫中国加快对台用武，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

(摘自《海外星云》)

为什么中国总是成为美国 两党互相攻击的目标？

□ 邓 鹏 李小兵 利国力

克林顿访华前曾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抱怨国会对总统制定对华政策干预过多。他认为国会每年都就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辩论对美国有害无益。国会的过多干预使总统在推行对华政策时没有“必要的灵活性”。克林顿所指责的当然是共和党占多数席位并牢牢控制的国会。他当然不会忘记在1996年大选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Bob Dole)是如何激烈地攻击他的对华政策。但是，克林顿也许记得在1992年大选时，他也曾不遗余力地攻击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指责布什政府在“六四事件”后对华制裁不力。为什么中国总是成为两党互相攻击的目标，成为美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呢？

首先，冷战意识仍然在不少美国人的头脑中作祟。冷战后，中国似乎是世界上惟一没有瓦解的共产主义大国。这些人眼中，反华就是反共，大方向是对的，只会得分，不会丢分。其次，美中关系的很多重要问题并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与美国利害关系的问题。如台湾独立、两岸问题，以及中国的人权。对这些遥远的问题可以唱高调，招徕听众，其实不着边际，不需负责，何

乐而不为？

美国政治特点为“两党体制”，政府宪政体系为“三权鼎立”，互相制约。此一政体目的是避免出现专权或独裁，增强监督与平衡，使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透明化。难怪在里根和布什的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选民支持民主党控制国会，避免“一党制”的政府。而克林顿作为民主党总统人主白宫以后，共和党在两院议员选举中接连获胜，取得国会的多数席位。

美国人民似乎对政府有一种天生的防范心理，这种防范心理的最佳表达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种心理近年来有增无减，大选结果表明，美国选民实现一种默契，把国会和白宫分别交给共和党和民主党人，让它们互相抵消，老百姓过好太平日子，完全没有以往中国人“官家打仗，百姓遭殃”的担忧。这种民主政治在外交上造成了“政出多门”的怪现象。

广大选民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宪政体制的民主特点，限制总统或是国会的权力，以预防任何一党为了本身的政治利益而作出有违国家整体利益的政策决定。这几乎成了一个美国政治的传统，即一党